

晚清新学书目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与政治诉求

刘开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晚清出现了一股编纂新学书目的高潮。它们通过提要、类序、自注等多种形式,评论晚清新学历史书籍,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批判世界史编纂的语境中争取中国史家的话语权;在对外国(主要是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史的批驳中进行国民爱国主义教育;著录、评论中国史家的新学历史撰述,反映出晚清史学的自我期许与学术自信。晚清学者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在所撰写的新学书目中,通过对兴亡史和变法史的评论寄予了保国、强国的政治诉求。

关键词:晚清;新学书目;民族本位;政治诉求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4)04-0055-07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的最初几年间,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教会组织等机构开始有规模地翻译西学,加之晚清中国有识之士撰写的外国史地、科技、游记等,新学在学术门类中的地位迅速崛起。这里所说的“新学”,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时间上,是晚清几十年间出版的著作,二是具有与中国传统学术不尽相同的新内容、新思想。新学以译著为主,也包括晚清学人的自撰。新学著述的不断涌现,直接推动了专门评介各种新学的书目著作的出现。晚清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学书目当首推

梁启超于1896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时务报馆印行)^①。改良之路虽很快日暮途穷,但由梁开创的编纂新学书目事业却蔚然成风,并在晚清最后十多年间达到了高潮。梁氏的学、政、杂分类理论奠定了后来多种新学书目大体框架,并以其鲜明的指导思想引领了新学书目的编纂。此后涌现了诸多有影响的新学书目,如沈桐生《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1897),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8),黄庆澄^②《中西普通书目表》(1898),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1901),徐维则^③、顾燮光^④《增版东西学书录》

收稿日期:2013-03-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晚清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与成就(1840—1911)”(12YJC770038)

作者简介:刘开军,男,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① 在1896年之前,与新学书目有着亲缘关系的著述主要有两种。1880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撰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该书介绍了1879年以前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西书的情况,虽附录了书目,但该书重在“事略”,主旨是论译书之方法、译书之益处。1890年,王韬的《泰西著述考》出版。该书的实际编纂时间当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王韬正在上海墨海书馆从事译书工作,因工作之便而关注来华传教士的著述。《泰西著述考》在体例上以人物为线索,在内容上,偏重于传教士生平介绍,略于对著述的评点。后来的系列新学书目多未采用《泰西著述考》的体例。
- ② 黄庆澄(1863—1904),原名炳达,字源初,晚号寿昌老人,浙江平阳县人,为孙诒让弟子,与陈黻宸等人交游,曾受到俞樾等名家的赏识。1889年,黄庆澄任上海梅溪书院教习时,便讲授西学。黄氏还创办了《算学报》(1897年)、《史学报》(1898年,我国最早的史学专业杂志),撰有《东游日记》,记述他游历日本之见闻。
- ③ 徐维则(1866—1922),浙江绍兴人,与其父徐友兰均为著名藏书家。徐维则与蔡元培关系甚密,当《东西学书目》出版时,蔡元培为此书作序推介。关于徐维则的详细生平,可参考钱斌、宋培基的《藏书家徐维则事迹钩述》,《文献》2008年第4期。
- ④ 顾燮光(1875—1949),字鼎梅,浙江绍兴人,酷爱金石、目录之学,除《译书经眼录》外,还著有《非儒非侠斋集》。

(1902),梁启超《东籍月旦》(1902),沈兆祯《新学书目提要》(1903-1904),顾燮光《译书经眼录》^①,陈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等。据不完全统计,晚清问世的新学书目多达二三十种。这些书目虽体例不一,宗旨略殊,然大多注重著录历史类书籍,如《增版东西学书录》首列“史志”,分为通史、编年、古史、专史、政记、战记、帝王传、臣民传记八种,评介了96种历史著作。新学书目通过提要、类序、自注等多种形式,评论晚清史学的新动向,反映出浓厚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晚清学者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在所撰写的新学书目中也寄予了鲜明的政治诉求^②。

一、民族立场与史家主体的觉醒

这里所说的民族立场与史家主体的觉醒主要是指评论家在学术品评过程中民族身份的凸显和晚清史家自我意识的张扬。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新学书目作者群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崇拜西学,相反在涉及中国史与中国史学的地位和国民历史教育等重大问题时,他们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立场。

第一,在批判晚清时期世界史编纂的语境中争取中国史家的话语权。

晚清最后十多年间,世界史的编写与译述空前兴盛。然而,令中国史家尴尬的是,一则当时的世界史几乎都出自欧美与日本学者之手,二则这些五花八门的世界史却很少论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这种情况不难理解。晚清中国积贫积弱,面临沦为列强殖民地之危险,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中国史也自然被排挤出了世界史的范畴。

晚清各种世界史、万国史在叙事重心上的这种偏颇,自然逃不过梁启超的慧眼。富有爱国精神和史学素养的梁启超为此发出了沉痛的批判与呐喊:

日本所谓世界史、万国史者,实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

一种族兴废存亡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欧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美国、俄国而亦不载,他更无论矣。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无可以厕入于世界史中之价值。此在日本或犹可言,若吾中国则安能忍此也。

近年以来,知其谬者渐多。[1](P91)

这不到两百字的评论堪称经典。梁启超冷静地分析了西方史家撰写世界史的“自尊自大”,以及日本史家盲目西化的心理。日本学人认为东亚民族简直没有被写入世界史的价值。梁启超说,这种话日本人可以说,在中国则行不通,“若吾中国则安能忍此”一语千钧,把中国史家的民族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梳理了当时的世界史后,梁启超觉得都不能满意,甚至产生了亲自撰写《泰西通史》的设想。“近年以来,知其谬者渐多”,并不是梁启超的自我安慰之语。驳斥叙事偏颇的世界史已经成为其时有识史家的共识。

继梁启超之后,信奉进化论的沈兆祯在批评以西方为叙事中心的世界史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1903年,日本学者雨谷羔太郎、坂田厚允编辑的《世界史要》由吴家煦翻译,并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是晚清世界史著作中较知名的一种。沈兆祯在《新学书目提要》中却批评该书“所纪皆西洋之事,东洋历史概付阙如,于世界史之名称不无矛盾,顾泰西以文明自诩,雄长地球之心,凌灭他人之志,视世界中无一国可与相并,故恒称其史为世界史,实则世界史即西洋史耳”[2](P455),一语中的地指出了该书虽以“世界史”为名,然实为西洋史的弊病。上海作新社译的《万国历史》也不例外,“所述诸事不及亚细亚诸邦而辄命曰‘万国’,此其名义之未安也”[2](P449)。顾燮光也发表了类似的批评,认为《万国历史》“所述诸事不及亚细亚诸邦,于命名‘万国’未免

① 《译书经眼录》初版于1934年,杭州金佳石好楼石印。但据顾氏本人和友人诸宗元所讲,该书“草创于卅余年前”,正是顾燮光“醉心新学”之时。从《译书经眼录》著录著作的断限来看,是起于1902年至1904年,由此推断,可知该书的编辑年份应在1905年前后,属于晚清新学书目的研究范围。

② 史学界对于晚清西学书目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许学霞、叶树声的《〈西学书目表〉对分类的突破及其影响》(《图书馆杂志》,1988年第4期)、张志伟的《近代东西学书目初探》(《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年第2期)、孟昭晋的《康有为的目录学思想》(《图书馆论坛》1993年第4期)、张晓丽的《论晚清西学书目与近代科技传播》(《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期)、李立民的《顾燮光两部晚清新学书目初探》(《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等,还出现了以晚清西学书目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即李樱的《晚清译书目录之研究》(北京大学1984年硕士论文)、汪美葵的《晚清西学书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这些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已有的研究多是从目录学和近代科技思想传播的角度展开的,且集中于《西学书目表》等几部目录提要的个案研究。本文则以历史类书籍提要为中心,以史学批评为切入点,重点讨论晚清新学书目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及其价值。

不顺”[2](P226)。同一部著作被不同的评论者指责同样的缺失,不能不说是当时书目评论家的共识。其他如谓日本学者天野为之的《万国通史》“所记详西略东,未免与《万国通史》之名不符”[2](P226),松村介石著的《万国兴亡史》“命名‘万国’而阙东洋各国,揆之著书之例,未免名实不符之谓”[2](P227),这些评论表面上看去,只是循名责实的评论,似乎只是在书名上较真,实际上名实之辨的背后蕴含着的是话语权的争夺,凸显了晚清史家的民族本位观念。

第二,在对外国(主要是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史的批驳中进行国民爱国主义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强侵略的危机中,中国史家已认识到通过本国历史教育来培养国民精神的重要性。“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1](P101)然晚清国人自撰的新式中国史佳本并不多见。倒是日本史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这些著作曾对晚清知识界和晚清教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晚清史家对于当时涌现的汉译史籍多持“聊胜于无”的心态[3](表二《史学》小序),并殷切期盼中国史家撰写出优秀的中国历史著作,表示不能依靠翻译外国学者的中国史著作来满足晚清社会对于本国史的需求。

1903年,由日本学者市村瓚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的《支那史》由教育世界社译入中国。这部书在日本是作为中学教科书使用的。但梁启超指出:“若我国学校据为教科书,则有所不可。”梁启超为什么不赞成以日本人所撰的中国史作为中国人的历史教科书呢?这是因为“日人以此为外国史之一科”,而“本国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梁启超说撰写一部完整、优秀的中国史,“恐非可以望诸他山”[1](P99),即不可寄希望于他人。如果没有明确的民族观念,没有自觉的史家主体意识,是很难将这个问题分析得这样深刻的。

晚清新学译著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怪现象,即个别国人在翻译日籍时别有用心地为自己取了日本名字,目的是借日本人之名为自己增加分量。如新中国图书社洋装本的高山林次郎著《释迦牟尼传》,译者署名为雄飞太郎。顾燮光评论道:“本书多节抄《佛本行集经》杂凑成书,所言多未得佛教真相。原著凡十四章,译者加以案语,亦无大乘理想,且释迦

事实吾华佛书具在,多可考核,取材东籍未免辗转失真。至按语云中国所传释迦行状多误谬不经,不考著者所据之书贸然言之,崇拜外人之心何其挚耶?至隐名而模仿外人,真无爱国思想矣。”[3](P241)重点批判译者的盲目推崇日本学者,甚至隐没真实姓名,在评论者看来,这是一个关乎到是否“爱国”的问题。沈兆祯为这部《释迦牟尼传》所写的提要则以委婉的方式和调侃的语气表达了与顾燮光相同的认识与情感,说:“署名曰雄飞太郎,亦由赵瓠北《廿二史札记》所云崔或(当是‘或’,引者)之署名拜帖木儿、高寅子署名塔失不花,皆以汉人习蒙古之名以为骇俗之计,此更以习东洋之名以为荣,殆所谓识时务者与?”[2](P491)沈兆祯举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汉人多作蒙古名》中的汉人崔或取蒙古人名为例,笔锋所指却是其时以日本人名为荣的“识时务者”,这是对崇拜东洋而妄自菲薄者的鞭笞,也蕴含着晚清史评家对民族身份的一种认同感。

新学书目也对一些日本学人的中国史撰述表示不屑一顾。日本学者三岛熊太郎撰写了一部《支那近三百年史》。沈兆祯读后写道:“近来日本人于中邦事实,若能毛举数节便尔沾沾著书……中国人欲知本朝掌故,自有典籍可稽,不必藉重于此,要非世所急读也。”[2](P459-460)当他评价日本人所撰的《支那文明史》时,批判的口吻更加严厉:“摘叙诸条不甚得体,征引旧籍青黄杂糅,殆将自炫其博,实则徒乱人意。又颇涉及经学,然家法不明,则所知已浅,所挟者小,而欲持此以窥古国之文明,亦见其不自择也。……若自中土硕彦为之,其于别裁之际必当斐然可观,慎勿使东家髻儿操管以睨我也。”[2](P501)毋庸讳言,“髻儿操管”之称固然有失词气之谦和,但这也是当时民族本位意识的一种曲折反映。

第三,晚清新学书目特别留意著录、评论中国史家的新学历史撰述,反映出晚清史学的自我期许与学术自信。

书目著录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学术批评方式。书目著录甄选和裁汰的过程其实暗含着某种评论,这与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选本批评具有相通之处。在晚清新学书目作者眼中,中国史家已经在新学著作之林中占有了—席之地。如在《西学书目表》中,梁启超共著录了25种史志著作,其中包括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徐建寅^①的《德国合盟本

① 徐建寅(1845—1901),我国近代著名化学家徐寿之子。徐建寅与傅兰雅一起翻译了许多关于军事、化学、电学方面的新学著作,1879年出使德、英、法等国,还撰写了《欧游杂录》、《德国议院章程》等。

末》、《美国合盟本末》，沈敦和^①的《英法俄德四国志略》。在《西学书目表》的附卷中，梁启超还特意设立“中国人所著书”一目，收录了晚清知识分子所撰关于外国史地、交涉、游记、议论等120种。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名为“西学书目”，但实际上也著录了国人的历史著述，如松筠的《绥服纪略》、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魏源的《元代西北疆域考》等，并且特别声明“是篇以西书为主，故中人撰述多附见于后，毋以为外夏内夷也”[4]（《略例》）。徐维则和顾燮光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附录“中国人辑著书”，第一小类即“史志”，包括了43种著作。《译书经眼录》卷八为“本国人辑著书”，其首类也是“史志”，包括了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教科书》等42种著作。虽然附录的这些国人撰述，只是简略地列出书名、作者、版本。但是，通过书目这种形式，中国史家在新学撰述上的地位得到了强化。

如果说著录还只是一种无声的言说的话，那么提要则是铿锵有力的赞扬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名作，在当时的新学书目中获得了如潮好评。梁启超说：“乡人黄君公度，近纂《日本国志》，体例明通，议论闳达，直跻古人著作之林，与舌人之手笔，相去不可道里计矣。”[5]（P1163）赵惟熙在《西学书目答问》中谓《日本国志》“自出机杼，义例宏博，择精语详，与译自舌人者不同，可为外史之冠”[4]（卷一《日本国志》提要），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采辑甚富，考订尤详”[4]（卷一《朔方备乘》提要）。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仅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编写的《中东战纪本末》，还有晚清士大夫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在甲午战史研究上发出了中国史家的声音。沈兆祯也为之宣扬，说姚锡光“于时方参兵幕，奔驰于烽燧之间，则所闻各条较为可据，亦固其宜，虽未必察及深情，第陈外状亦既可睹，行文叙事尤为雅驯，书之所以当传也”[2]（P469），这又何尝不是晚清史家主体意识的一种觉醒。在国家危难之时，民族意识一旦迸发，政治诉求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评论兴亡史与保国呼声

摆在晚清国人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挽救亡国灭种之危局。这也是新学之“新”的题中应有之意。新学书目作者也自然地将他们的政治诉求注入

到书目提要中。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晚清新学书目中得到了升华。1896年，盛宣怀奏准创办了上海南洋公学。1897年，时在南洋公学的沈桐生“扩览译史”，目睹时局剧变[6]（卷下《史学总叙》），编成《东西学书录总叙》两卷^②。沈桐生在论史学时，强调的是“盛衰迭代之机，文野推迁之迹，祸福倚伏之数，割据分并之形”，要“践实以征详”[6]（卷上《自叙》）。其思想轨迹是围绕着国家兴亡、民族盛衰展开的，与19世纪末年清朝的政治主题一致。沈桐生说：“学之通变因乎时，政法艺术贵通今以致用。……大地事故积久愈繁，欲昭伟略而匡时变，须审敌情而广师资。”[6]（卷上《自叙》）这里强调的是“通变”和“通今致用”。沈桐生说这些话显然都是有所指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此后，帝国列强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中国的狂潮。沈桐生所谓“匡时变”和“审敌情”、“广师资”无疑是针对中国所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和民族危亡之局而言的。

兴亡史是晚清新学历史撰述中的大宗。在提要中，晚清史家重点评论史书中关于国家兴衰、民族强弱的内容，言辞之中流露出以他国之兴亡为中国之鉴戒的认识，大多言之有物，暗有所指。新学书目对于国家或民族的兴衰历程考察与评论的落脚点则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避免重走他国沦灭之路。

晚清中国处于列强环伺、割地赔款的境地之中，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与民族相同的命运或由强而弱的道路自然引起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特殊关注。《世界史要》“详述民族之变迁、文明之递嬗、社会之兴革、政治之得失，提纲挈领，纤悉靡遗”[3]（P223）。世界史之外，一些重要的国别史也受到重视。如《译书经眼录》评价桑原启一的《希腊史》“于希腊兴亡之迹、欧洲文化之原，尤能慨乎言之，发人猛省，诚史学中所宜读之书也”[3]（P232）。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俄国蚕食亚洲史略》就俄罗斯入侵我国新疆等事发论，也得到了新学书目作者的共鸣：“近日俄谋愈坚，抚卷之余可为深念，前烈之遗墨未干，旧都之悬谈犹炽，天衢生棘，岂有艾乎？”[2]（P471）另有一部《东亚将来大势论》（原名《支那问题》，日人持地六三郎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预言中国将来必为俄国人所统治。沈兆祯针对这一论调写道：

作者谓支那之前程必为俄罗斯之属，

① 沈敦和（1866—1920），字仲礼，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专攻政法，1902年担任山西大学堂督办，译有《德国军制述要》、《借箸筹防论略》等。

② 《东西学书录总叙》的《总目》与《自叙》并非在书首，而是夹在卷上《地学总叙》中间，疑为刊刻之误。

殆视支那无一人矣,蔑视乎支那而第言日本应如何保全、如何抵抗、如何奋发以挽救大势,夫日本与支那虽为唇齿,然亦秦人视越人之肥脊,无痛痒相关之意,支那之分割,吾知日本且与泰西列强得分羹染指之惠,岂真有爱情于支那乎?吾得而断之曰:支那者支那人之支那,支那之亡,支那人自亡之,支那之兴,支那人自兴之,将来之东亚,其果如持氏所言乎?[2](P493)

“支那者支那人之支那”一语喊出了爱国志士的心声,是那个时代关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最强音。在沈兆祯发表这番言论的翌年即1904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持地六三郎的“预言”似乎别有用心。而沈兆祯目光如炬,看透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指出在侵华问题上,日本和欧洲列强并没有本质区别,它们看重的都是“分羹染指”之利。沈氏提出中国的兴亡应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其政治意义不同寻常。

1903年1月,夏清馥编译的《印度灭亡战史》由上海群谊译社出版。印度是与中国接壤的大国,在19世纪中期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亡国史引起了国人的思考:“印度为五千余年文明旧国,土地、人民广莫繁殖,英人克莱武以商社书记率兵数百竟灭其国,英人以商为处置印度之策,其阴谋即为各国之准,利益均沾,遍地通商,遂群以印度视我矣。作者备述英之狡狴,为他书所未详,足为参考之资,其亦同抱螯纬之痛也乎。”[3](P250)直接把晚清中国的命运与印度灭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让国人感同身受。

不仅邻国之亡振聋发聩,即便是在地理上与中国相距甚远的波兰之兴亡,在新学书目中也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日本学人涩江保的《波兰衰亡史》叙述波兰盛衰甚详,有评论云:“波兰者西方之大国也,其版图仅小于俄,兵强极于一时,未几为俄、普、奥三国瓜分,贵族、民人同沦灭亡,可悲也夫。是书分三编,总论共十二章,推论波兰灭亡之三原因,一国王公选之弊,二外国干涉之祸,三人民不得与政治之故,言之极详,堪为殷鉴。”[3](P251)究其真意,晚清中国实与波兰有若干相似之处,同为大国,一度曾同为军事强国,又同样被列强瓜分、侵略。至于波兰衰亡的三个因素:君主问题、外国势力的干涉、普通民众缺乏政治参与在晚清中国也同样存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看到波兰的衰亡,不免有同病相怜之感,也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以波兰为鉴的认识。

1897年4月22日,江标、唐才常等人在湖南长

沙创办了《湘学新报》,该报的前20册每期都刊发“书目提要”,共为数十种历史著作撰写了提要。在晚清众多新学书目中,江标与唐才常开创了以新式报刊为书目载体的新模式。较之专著,报刊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面也很广,故而《湘学新报》上的书目提要实有考察之必要。《湘学新报》上的史学书目提要中的政治诉求同样鲜明。该报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的评价是:“大旨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英为泰西枢纽,所纪独详,法为欧洲治乱关键,首二三卷先以法事为本,又为二卷,缀于英后。此外,德、奥、意、俄、土、美六国各一卷,教皇一卷,总结一卷,附记一卷。盖一以取法,一以垂鉴者也。近译各国史志,多二十年前书,惟此书近事颇详,实为西史肯要。”[7]很显然,“取法”、“垂鉴”都是针对中国而言的。言下之意,中国要以泰西诸国的治乱为鉴,这是晚清史家眼中《泰西新史揽要》的价值所在。艾约瑟翻译的《罗马志略》,记“欧洲治乱之迹,自以罗马为大关键。其君民争权,祸千百年未渫,尤后世有国者无穷之鉴戒”[8]。至于《万国史记》,则“研求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亡实际者败,古今不易之理也。……读是书者可以悚然矣”[9]。晚清史家迫切地要从史书中了解世界,认知列强,探求兴衰之故。这些也就决定了他们十分关注史书的现实价值。《隔靴论》“论中国十败与英国十胜,比互言之,能洞见所以然。……然则日本知中国弊政久矣”[10]。《隔靴论》之名当是取自“隔靴搔痒”之义,意为肤浅之论、泛泛之谈,但实则深中清廷之弊。联想到三年前的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史事,末句“日本知中国弊政久矣”的意味更显深长。《湘学新报》为《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撰写提要时,也是将其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联系起来,评价该书的价值:“今日中国,俄北耽,英西隣,法南瞰,德日修其军制商务,思染指各海疆,危悚万分,言外凜然。书中述各国学校规制,推德为尤详备,盖画龙点睛处也。”[11]这已经是明明白白的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想法了,倘若不对当时中国的周边局势和列强瓜分中国的意图有明确的认识,是很难写出这些话的。因为作者对时势了然于胸,故而对《英法德日四国志略》的“画龙点睛”之评可谓点石成金。类似的思想认识与情感在有关诸国的独立史、战史的书目提要中是屡见不鲜的。

除了上述私人编纂的新学书目提要外,清廷官方也编印了《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二卷。该书印行于1909年,距离晚清覆亡仅有两年,堪称晚清新学

书目的殿军。《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也从政治兴亡上考量史书的价值,揣摩作者编纂的旨趣,如在评《俄国新志》时,即写道:“俄为君权专制,压制属地例尤苛。其民歆羨自由权利,故多乱党。”^[12](卷一《俄国新志》提要)“乱党”这样的字眼在1909年的中国恐怕也是有所指的,而“乱党”也是关乎清廷的存亡的。从时代的呼声来看,救亡保国是最迫切的诉求,而如何自强则是更值得人们思考的课题。

三、研读变法史与强国诉求

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民族的生死危亡,晚清史学与政治的联系显得更加紧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间,维新变法的风潮弥漫于晚清朝野。变法运动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历史运动的方向。戊戌变法虽在1898年因为顽固派的扼杀而归于失败,但却引起了人们对各国变法史的留意,变法类著作尤能引起晚清士人的持续关注与广泛评论。他们把对晚清中国变法失败的思考与他国变法之得失联系起来,并由此探究中国的自强之路。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得到了大发展,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地位,并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清廷,一跃而为东亚强国,这大大刺激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本变法成功的经验成为晚清学人迫切探究的问题。《日本书目志》涵盖了19世纪后半期日本新出的书籍目录,第四卷《图史门》专门著录历史地理类图书。康有为将史学划分为万国历史、各地历史、日本历史(附小学历史)、传记、本邦历史考证、年代记、年表等,指出:“《欧罗巴文明史》、《泰西通鉴》及《揽要》、《纲纪》诸书备哉粲烂,其印度、希腊、罗马、埃及、佛国革命史,皆可考焉。我之自论,不如鉴于人言,可去忌讳而洞膏肓,若鉴而用焉,皆药石也。”^[13](P312)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要以印度、希腊诸国之史为“药石”,医治已经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康有为为清廷开出的药方就是变法。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他在《日本书目志》中著录的204种日本史中,重点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著作。在这些日本史著作之后,康有为写了一段五百字左右的小结,先是说日本史学原本乏善可陈,“正史体裁犹未备”^[13](P317),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开化起源史》、《大政三迁史》、《明治历史》、《政史》、《太平记》、《近世史略》、《近世太平记》、《三十年史》,皆变政之迹存焉。”所以,要著录这些日本史,“以告吾开新之士焉”^[13](P318)。康有为将日本的强大归功于变法,主张向日本学习经验,他还撰写了

《日本改制考》进呈光绪皇帝。联系康氏的这些政治活动,会对他在评论日本史学上所表现出变法理想多一分理解。

晚清也出现了多种关于日本明治维新重要人物的传记。新学书目在评论这类著作时,论说的重点也是变法与强国。《日本近世名人事略》“考求日本变法维新之基由,与游侠义愤、博学远见之士知有国耻,甘杀身以佐其君、兴其国,至今读之尤凛凛有生气焉”^[2](P28)。“日本明治变法二十年,名震全球,为亚东雄国,虽由睦仁之力排众议以求维新,然其得人之盛有足称者”,读日本人阿东处士、田岛象二的《明治中兴云台图录》宜“知变法自强之际非一手一足所可奏效,则所以广学校、开民智者可不亟亟图之哉”^[2](P27)。在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四年后,学者们在阅读日本变法史时反思本国变法的得失。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思考在晚清新学书目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顾燮光认为阅读《日本中兴先觉志》可“于日本当日变法与今日自强之原委思过半矣”^[2](P28)。在评论东京博文馆编辑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时,顾燮光也特别指出:“得是书可以研究三十年维新之进步、泰东变法得失之林、亚洲政界先路之导,洵杰作也。其中军政史、外交史、财政史三编,尤宜取而先读。”^[3](P231)这些话均指向强国路径。

从1887年11月开始,受清廷派遣出国游历的官员顾厚焜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先后考察了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因日本为同文之邦,维新之政取法泰西,乃详考其制度”,于1888年出版了《日本新政考》。此书后又于1897年被梁启超收入《西政丛书》印行。1897年9月17日,《湘学新报》为该书撰写了提要,指出当顾厚焜撰写这部著作时,“日本富强未著”,当时不少人“痛诋日本之变法为弃本”,而顾氏“独成此书,可谓识时之俊矣”^[14]。《湘学新报》是湖南维新派的理论喉舌。自1894年以来,陈宝箴到湖南任巡抚,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江标、徐仁铸任湖南学政,陈、黄等人从政开明,力主变法维新。由他们所创办的《湘学新报》自然偏向于宣传变法思想。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恰恰符合维新派的宣传需要。此外,《湘学新报》评《五洲各国志要》“以变法规吾华,尤汲汲焉”^[15],也是从维新变法者的视角展开的论说。

日本明治维新之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变法史也是晚清新学书目作者群的评论的重点对象。李提摩太的《列国变通兴盛记》是一部反映俄国、日本等国变法的著作。黄庆澄在《中西普通书目表》有限的

篇幅中,对《列国变通兴盛记》评价道“纪俄、日事颇详”[3]〈表二《列国变通兴盛记》识语〉,显然是看到了该书的变法价值。徐维则也对《列国变通兴盛记》赞誉道:“欲变法自强者观是书可以决所从事矣”[3](P19)。而梁启超则对《列国变通兴盛记》予以更加理性的分析,说:“其名甚动人,然书中惟记俄罗斯、日本二篇足观,其他则亡国之余,而以为兴盛,于名太不顺矣。”[5](P1164)这一批评倒是有几分道理。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天皇改革是康有为、梁启超效法的对象。梁启超在戊戌维新的前夜这样评价《列国变通兴盛记》也是符合他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的。倒是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得到了梁启超的肯定,“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5](P1164)。无论是对《列国变通兴盛记》还是《泰西新史揽要》,梁启超评判的重心都是它们能否提供变法的经验,是否具有资鉴中国变法的价值。另一部介绍欧洲各国变法的著作《欧洲列国变法史》也引起了书目作者的点评,着眼点也是该书的借鉴功能。顾燮光说:“欧洲各国之变法也,成于十九周以后,远因近果各有不同,英之变法也以和平,法之变法也以扰乱,若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各国,皆以外侮日迫而不能不变者,盖所处之势不同,故调剂维持之道遂异,其足为我借鉴者一也。……书中所记变法,于英、法、日耳曼特详著之者,为法人故能言之侃侃,若俄罗斯变而未善、土耳其拘守不变,均日就衰弱,皆附及焉,以明法之不可不变而变之不可不尽善也有如是夫。”[2](P247)这里所说的“外侮日迫而不能不变者”正是晚清中国变法的外因。顾燮光认为应当变法,而且变革宜彻底,这是他从欧洲列强的

发展史上得出得来的认识。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打击维新派,变法的成果几乎荡然无存。在这样的国内局势中,顾燮光仍有勇气说出这些话,实属可贵,而他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具体主张,不如说是当时学者普遍的强国诉求。

晚清新学书目具有的政治属性并不是说政治操纵了史学,也不是说救亡与变法制约了史学评论,而是史学反映着、影响着政治,史学批评沟通了史学与时代。借助书目这种传统学术形式,晚清史学获得了新的活力。晚清新学书目中的民族本位精神与政治诉求架起了人们认识晚清新史学的又一道桥梁。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 熊月之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 [3] 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M].刻本,1898.
- [4] 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M].贵阳学署刻本,1901.
-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M].夏晓虹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6] 沈桐生.东西学书录总叙[M].读有用书斋刻本,1897.
- [7] 《泰西新史揽要》提要[J].湘学新报,1897,(1).
- [8] 《罗马志略》提要[J].湘学新报,1897,(18).
- [9] 《万国史记》提要[J].湘学新报,1897,(1).
- [10] 《隔靴论》提要[J].湘学新报,1897,(11).
- [11] 《英法德日四国志略》提要[J].湘学新报,1897,(19).
- [12] 陈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M].印本,1909.
- [13] 康有为全集:第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14] 《日本新政考》提要[J].湘学新报,1897,(16).
- [15] 《五洲各国志要》提要[J].湘学新报,1897,(20).

责任编辑:杨春梅

The National Standard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Appeal of the New Learning Bibliograph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U Kai-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a climax of compiling the new learning bibliograph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ew learning bibliography reflects the strong national standard historian awareness. The authors of bibliography struggled for voice in the context of criticizing the compilation of world history. They strengthened patriotism education through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history 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s. The new learning bibliography contained the scholars' academic self-confidence. Therefore, those bibliography have special importa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tory. By commenting the rise and fal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other countries, the late Qing dynasty scholars expressed political appeal.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new learning bibliography; national standard; political appeal